

从雅典到明朝: 瘟疫下人类的悲情与抗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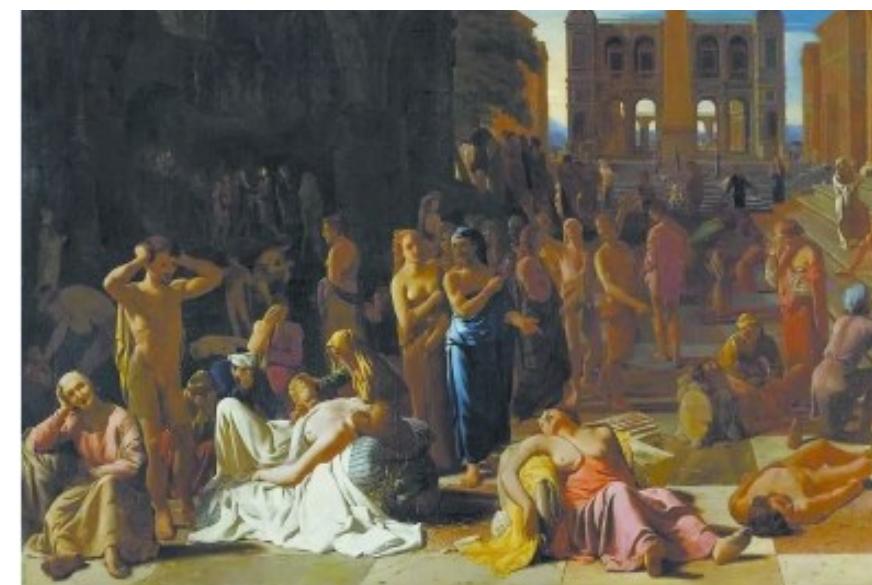
人类详细记载的 第一场大瘟疫

公元前430年,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中,搅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了关键时刻。但是,谁也没有料到,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,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雅典。几乎在顷刻之间,从海边到内陆,从城镇到乡村的大片土地,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,发热、呕吐、极度口渴、失去知觉的人越来越多……死亡的气息蔓延在雅典的每一个角落,一度被视为骄傲的雅典社会治理体系趋于崩溃。

史学家修昔底德在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记载:“瘟疫是从比雷埃夫斯进入雅典的……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,也是唯一食物及补给的来源。地中海东部的许多地区也有发生瘟疫,但影响较小”。雅典成为疫情的重灾区,几乎有一半的人都病倒了,瘟疫摧毁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。修昔底德无限悲痛地记录着当时的惨剧:“这是一场巨大的浩劫,以至于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对任何法律规则都变得漠不关心……”

更可怕的是,面对疫情,人们束手无策,不仅平民百姓大量死亡,连城邦的统治者、著名改革家伯利克里也死于这场瘟疫。修昔底德在史书上记载着:“医生与病人的接触最多,死得最快。在人满为患的雅典,这种疾病导致约25%的人口丧生。看到雅典燃烧的葬礼火柴的场面,斯巴达人撤回了他们的部队,他们不愿接触与患病的敌人接触……”后世有些研究认为这场瘟疫至少导致雅典一半人口死亡,但不论是四分之一还是一半,这都是一场骇人的人间惨剧。这场瘟疫也改变了雅典的历史,雅典的社会秩序几乎崩溃,在后来与斯巴达的战争中连连失利,最终输掉了这场决定命运的战争。

至于这场骇人听闻的雅典大瘟疫结束的原因,民间一直有传言是医生希波克拉底(就是后来所有从医者都需要尊奉的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的作者)发现雅典很少有铁匠感染瘟疫后,意识到炽热的火焰可以驱赶瘟疫。当雅典人手持火把,几乎要点燃整个城市后,瘟疫终于散去。对这个说法,史学界一直争议不休,起码在修昔底德的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中并无相关记载。但不管怎么说,当温度提高时,空气中的病毒就会自然消失,可能是这场瘟疫结束的重要原因。当我们细细观察历史后会发现,有很多类似的瘟疫,都来去匆匆,它们几乎毫无征兆地暴发,又莫名其妙地消失,但在此期间,有太多无辜的生命要付出不必要的牺牲,甚至一些国家或文明都因此陷入无尽的黑暗。



西方绘画中的雅典瘟疫

与战乱相伴相生的瘟疫

雅典大瘟疫是人类有史以来详细记载的第一次瘟疫,但事实上,有很多残酷的历史并没有被记录下来,夺去数以万计的生命的可怕病毒,可能只是古籍上一笔带过的一句话,甚至一两个字。

在中国,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,甲骨文上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,比如“疾年”“疟疾”等词,就曾出现在记载的祭祀占卜活动中。但当时医疗条件落后,发生了瘟疫,人们只能通过鬼神之灾来祈求逢凶化吉。那是一个人命微贱的特殊历史时期,当大量奴隶与战俘倒毙在病毒面前时,商王与贵族首先想到的是远离这些可怕的群体,甚至很多人与牲畜一起,都在频繁的祭祀活动中,被当做献给祖先与鬼神的祭品来活埋或斩杀。因此,后人看到上古时期有关瘟疫的记载反而比近代要少,并非因为当时没有严重的疫病,而是记载丢失,或根本不会当成大事来记载。

随着对个体生命的重视与科学的进步,人们对瘟疫的记载越来越详细,对防疫的探索也越来越多。但尽管如此,在社会秩序混乱或战争期间,更容易暴发严重的瘟疫。比如著名的东汉末期的“建安大疫”,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,“建安七子”有五人没能熬过建安二十二年(公元217年的)这个可怕的冬天。

与雅典大瘟疫相似,“建安大疫”也发生在战乱期间,曹魏政权即将粉墨登场,魏汉交替的历史正在上演,崩坏的社会秩序亟待重建。当时,几乎没人注意到战争与疫病的关系,因为战场上死掉

的将士太多,流离失所、饥寒交迫的老百姓也太多,苟且偷生地活下去,是多数人无奈的选择。当瘟疫摧毁一个地区后,崩溃的不只是当地的行政建制,还有社会伦理。在乱世缺乏合理的动员机制与防控举措,人们只能听天由命。

曹魏建立后,随着社会秩序在中原地区的恢复,瘟疫竟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,而在南方,或许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,大规模的瘟疫相对较少,但具体在一个区域的疫情却时常出现,甚至随着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与人口流动,病毒也飞速传播,像蜀汉南征西南夷时,经常遭到瘴气的伤害,大量将士患病、死亡,这其实也是小规模的瘟疫。《三国志》中也记载了吴国将士远征海南时遭遇的严重瘟疫:“吴孙赤乌五年,大疫”,“秋七月,遣将军聂友、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、儋耳。是岁大疫,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”(此处珠崖、儋耳便是今天的海南岛)。但等人们解决了水土不服问题后,病情自然消失,或者说,人们已经产生了免疫力,可以与病毒长期相安无事地并存。



建安七子

中国防疫体系 的动员机制

与南北朝几乎同时,一场可怕的瘟疫沉重打击着西方的拜占庭帝国。从541年到599年,从君士坦丁堡到地中海沿岸的大量城镇,先后爆发了五次严重的瘟疫,史称“查士丁尼大瘟疫”,它至少造成两千五百万人死亡,欧洲人口因此下降了将近一半,甚至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君士坦丁堡每天都有五千人死亡。正如对拜占庭学研究颇深的历史学者陈志强教授在《世界历史》上曾刊文所讲的:“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成为疫区,其中君士坦丁堡、安条克、罗马和马赛是重灾区,在百年内四度流行鼠疫,而西班牙东南部、高卢和北非地区三度暴发鼠疫,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两度感染鼠疫”——这场瘟疫不仅彻底毁掉了拜占庭重建罗马盛世的梦想,也严重波及了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,对地缘政治与文明演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相比之下,在中国发生瘟疫后病毒的传播,更具有相对的封闭性。这一方面与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有关,另一方面也有历代中央帝国动员机制较强有关。比如,《明英宗实录》记载了景泰六年南京瘟疫暴发时的惨状:“死者相枕连途,生者号啼盈市。弃家荡产,比比皆是;鬻妻卖子,在在有之。”疫情发生后,明廷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办法,包括开仓赈民、减免赋税,从其他未受灾地区调拨物资,以解决民众之急需。而且,赈灾情况也与当地官员的仕途息息相关,赈灾不力甚至借机贪墨之徒,轻则免职,重则上刑。

正如《明史》中讲到的“内外官皆三年为一考,六年再考,九年通考,始行黜陟之典”,有这套管理考核机制在,当地的“父母官”不敢不认真对待,史书上也不乏那些赈灾济民的廉吏的故事。但从根本上说,古代中国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解决瘟疫与灾荒的行政体制,尽管其中的医疗水平相对落后,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套行政体制是否运转灵活,但总归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应急办法。

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,这些举措在历史上生根发芽,随着近代科学防疫方法从西方传入,到现代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防疫体系,这些举措不断配合医疗技术的革新而变化。但这套基于中国地缘特点与行政管理方式的防疫体制,却在很早之前就产生了原始的雏形,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演化。

(本报综合)

世间万象

“玫瑰白菜”面市



近日,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侯喜林教授研究培育出的“玫瑰白菜”正由学生创业团队策划包装,推向市场。“玫瑰白菜”形似玫瑰,还具有耐寒耐冻、维C含量高、味偏甜口感好等特点。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学生创业团队成员正在展示“黄玫瑰白菜”。

小猪运动会“萌”趣横生



近日,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儿村乡假日绿岛休闲农场,小猪在进行跨越障碍比赛。当天,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儿村乡假日绿岛休闲农场举行了一场“萌”趣横生的小猪运动会,一群憨态可掬的小猪进行了赛跑、跨障碍、跳水、游泳等项目的角逐。

蜂鸟戏花



在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内,一只叉尾太阳鸟在红苞花枝头采蜜。初冬时节,福建省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内的红苞花竞相绽放,吸引了大批叉尾太阳鸟前来采蜜。叉尾太阳鸟又名亚洲蜂鸟,是福州特有的“明星鸟”。

五胞胎雪虎宝宝亮相



近日,在济南野生动物世界,工作人员带着五胞胎雪虎宝宝一起亮相。当天,山东济南野生动物世界五胞胎雪虎宝宝首次与游客见面。据悉,雪虎属于孟加拉虎变异种,后代抵抗力低,易夭折,这次能一下生出5胎雪虎,还全部存活,非常难得。五胞胎雪虎宝宝四雌一雄,目前健康状况良好,萌态十足。

会画人像的机器人



近日,机器人在为一名参观者绘制人脸图像。当日,在深圳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,深圳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展出的一款智能识别机器人,现场免费为观众绘制人脸图像。(本报综合)

唐代诗人在长安的“宅”生活



为了战胜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,人们纷纷响应号召“宅”在家里,这是阻断病毒的最好办法。

如果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大唐首都长安,那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,诗人荟萃的地方。那时的诗人们也有“宅”生活吗?他们又能“宅”出什么花样呢?

白居易:编成“国考”指南

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因为参加“国考”,而在长安的上都华阳观里过了一段“宅”生活,结果“宅”出了一本书。

贞元十八年冬,白居易来到长安,和朋友元稹一起参加了吏部的“拔萃科”考试,白居易名列甲等,元稹考中第四等。第二年春,他们一同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。秘书省是皇家整理图书的机关,校书郎的职责就是管理“邦国经籍图书”,这是一个九品小官,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。

唐宪宗李纯元和元年(806),为了广揽人才,朝廷举行了制举考试,这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大考。唐代的制科,考取后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官职。制科考试最主要的是试策,所谓“策”,就是回答皇帝的“问”。皇帝所问的当然都是当前的时政问题,借以发现考生处理问题的才干。

这时的白居易和元稹因校书郎任期届满而赋闲,他们自然不能放过这个登高的机会,为了参加制举考试答好皇帝的策问,他们二人决定找个地方“宅”起来,他们发现长安上都华阳观非常僻静,适合搞学问。于是二人就来到这里,租借了一个房间,开始为这次考试用功作准备。白居易后来写过一首诗,讲述了此时的境况:“季夏中气候,烦暑自此除。萧飒风雨天,蝉声暮啾啾。永崇里巷静,华阳观院幽。”

白居易和元稹在华阳观中“闭户累

月,揣摩当代之事,构策目七十五篇”,白居易和元稹在这里“宅”了两三个月,他们竟然“宅”出了成果,写出了七十五篇策目。后来,白居易把这些文章编成四卷,这就是有名的《策林》。该书对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刑法、吏治、风俗等各个方面,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,堪称当时“国考”的经典教材。这些精心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,给白居易的“国考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这一段生活对白居易和元稹二人的思想、友谊也有了新的增进和提高。

这年四月,白居易和元稹参加了唐宪宗亲自组织的“才识兼茂,明于体用科”的策试。唐宪宗针对当时国家的内忧外患情况,问国家如何理政才能取得成效?面对这个问题,“宅”了三个月的白居易可不只是吃素的,自然是有理有据、针砭时弊、侃侃而谈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贞元十七年,韩愈终于通过铨选,给他这段“宅”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,也开启了韩愈政治生涯的新时代。贞元十八年春,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。贞元十九年,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。此后尽管韩愈屡受贬谪,但凭着他的实力,韩愈终于一步一步走上了大唐政治舞台的中心,实现了自己心中的梦想,成就了一个名垂千古的政治家和文学家。

李贺:“宅”出千古绝句

最后要说的是李贺,他不畏困苦的一生虽然短暂,但是他能够持之以恒、呕心沥血,终于“宅”出了千古名句。

任职期间,李贺的工作也不忙,他“宅”居长安,把全部心思都用到了创作上。当然,李贺并不是一味“宅”居,他有时要到生活中去发掘素材。每次出门,李贺骑着一匹瘦马,肩背一个布锦囊,他边行边思索,吟得佳句,就用随身所带笔砚,在马上写成诗条,投入锦囊。有时满载而归,囊中鼓鼓的;有时终日穷思苦索,竟不得佳句,囊空如洗。

回来后,李贺就“宅”在家里,搜肠刮肚、冥思苦想,试图想出满意的诗句。知子莫若母,李贺的母亲知道儿子勤于创作,更了解儿子身体经不起这样的折腾,很心疼他。一天晚上,李贺母亲看到儿子写出了不少诗句,又高兴,又心疼,叹息道:“儿啊,你非要把心呕出来才肯罢休啊!李贺那些著名的诗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。”

本来身体就不好,再加上刻苦写诗,李贺的身体每况愈下,不久就离开了人世,年仅二十七岁。但李贺短暂的一生,却留下了两百多首诗歌,许多是世代相传的名句,如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“雄鸡一声天下白”“石破天惊逗秋雨”等,可以说都是他“宅”出来的。

显然,唐代几位大诗人的“宅”生活是有意义和收获的。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过的“宅”生活,最终要看这种生活有没有意义和价值,让人们收获了什么?所以,不妨将过“宅”生活的机会作为充电奋斗的时机,把“宅”居当作“闭关修炼”,去学习,去努力地提升自己,让自己“宅”有所得,“宅”得精彩。

(本报综合)